

● 仓修良 著

方志学通论

(修订本)

字或宜守一开

在縣界山北廿二里穿戎谷中有嶽三

李一覽
去州廿里寺其依山 排松嶺階階
飛空紅梁飲溪巖壑以紅黃薄汗
映既切煙雲亦蔚星日上則危峯逆翠
溜溪澗寔仙居之勝地諒福愛之



方志出版社

方志学通论

仓修良 著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志学通论/仓修良编. —修订本.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122-936-3

I. 方... II. 仓... III. 方志学 IV. 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572 号

方志学通论 (修订本)

编 者: 仓修良

责任编辑: 李 沛 徐 宏

出版发行: 方 志 出 版 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12 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邮箱 zbsh@fzph.org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丽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75

字 数: 599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80122-936-3/K·531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仓修良

男，汉族，1933年出生于江苏泗阳，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一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98年国务院决定四校合并，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社会兼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温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等。主要研究成果：已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出版）、《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章学诚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古籍整理：《燭火录》（合作，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上、中、下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台湾里仁书局1993年出版）、《史记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汉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二十五史警句妙语辞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主持“二十五史辞典丛书”的编纂工作。还曾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写，并任《史学史》分卷编委，主编和参与编写教材多种。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并在这些方面都有所建树。另发表上述诸方面论文近两百篇。



作者简介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曰澗水直西流至瓜州
城北十餘里西南流一百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
南号爲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
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附亭驛
南即向西北流至廣運烽西北十餘里入沙河
獨利河水

右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沙州燉煌縣
東南界而多即流無兩竭涸

懸泉水

右在州東一百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倚出如

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後山暖雪消
水入河朝越夕漲其水又東北流卅里至
沙州城分派溉灌北流者名北府東流者
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
一名神農渠
一名陽關渠州
西北又分二渠北名都柳渠又從馬圈口分
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渠州城四面水
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嘉禾土流家
目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鷄五穀皆
饒唯無種桑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

派

古道出文河縣界至西北山外合通庭州

百五十里是水草唯通人馬

水調道

古道出文河縣界西北向度月已西諸營

是水草道中馬

鐵山道

古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烏青國七百里

沙磧通唯近烽是水草道中馬行

山窟院

丁谷窟有寺，有神院一所

古在柳中縣界至北山十五里丁谷中西

去列廿里寺其後山，排嶽巖隙階鷹塔

飛雲紅梁微漢藏壁臥乳叢薄汗

暇眺切煙雲亦遊星月上則危峯逆望

下輕溜潺湲定仙居之跡地詠福靈之

松城見有名額僧徒居焉

寧戎窟寺一所

古在折庭縣界山北廿二里寧戎谷中有數三

成臨危而峻壁畫壁四地祭迴而開軒觀

庭之以東霞亦限之以晴滿雲基語等

草木叢葩見有僧林久暮名

古塔五區

聖舍二區

古在州子城外東北自古老傳云阿育王之

所建也樞內東有法藏姓王輸加王

徒達八萬四千路阿輸加所阿育王已

內有故碑碣多是俗間故時佛釋聖人塔

吳郡志卷一

吳郡 范成大 撰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大伯仲雍李
歷李歷有聖子昌大王欲立李歷以及昌大
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
李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
立為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
即封其後為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

延祐四明志

提要

臣等謹案延祐四明志二十卷元袁桷撰桷
字伯長慶元人朱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少
為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翰林國史院檢閱
官累遷侍講學士卒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事蹟具元史本傳桷
文章博瞻為一時臺閣之冠所著易說春秋

提要

太倉州志卷之一

柳州府通判州人桑悅著

賜進士第前監察御史知太倉州事棗陽李端校正

同知太倉州事懷安周明編次

沿革

太倉州在蘇州府崑山縣治東南三十六里卽古婁縣之惠安鄉按舊志云春秋時吳王於此置倉故名太倉又曰東倉悅按東溪楊謨云此倉或曰吳王渚之倉或曰五代吳越王之倉夫渚都廣陵不應置倉遠七百里外枚乘說渚太倉乃在海陵今泰州也若云錢氏之倉不惟去國都太遠且屢爲淮南所陷殆其邊境不可儲蓄據此爲春秋時吳王之倉無疑又曰東倉地居吳東益可信矣陳仲太倉事蹟以爲吳孫權結好

乾隆四十四年重修永清縣志在事諸人姓氏

監修

欽命工部右侍郎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加三級汪廷璵

江南歙縣人戊辰進士

主修

永

清

縣

知

縣周震榮

浙江嘉善人壬申舉人

同事

永

清

縣

儒學

教

諭劉

璵

直隸平山人庚寅舉人

永

清

縣

儒學

訓

導宋宗

葵

奉天遼陽人壬申舉人

纂修

侯

補

國子

監

典

籍章學誠

浙江會稽人戊戌進士

首事

已

卯

科

舉

人劉

格

本縣人

修志姓氏

(清乾隆)《永清縣志》

章學誠纂修

清嘉慶十八年刊本

题 辞

余始弱龄，精治小学，好涉览乾嘉诸儒著述。稍长，读章实斋书，服其识议通达，足以矫当时学者溺于名物训诂之枉，自是卓然特立之士以补偏救弊自任者也。尝就其遗书各种，撮钞其精言要义而熟复之。自以为爱读章书者，莫我若矣。晚岁游历四方，与仓君修良邂逅桂林，其年方过四十，方任教于杭州大学。文质彬彬，蔼然可近。因与纵论学术，知其亦寝馈实斋之学，引为同好，相交益亲。后余数游杭州，得造其庐。观所纂述之文，充积几案。其于章实斋与《文史通义》，既有专著论列之矣。继是而治史学史，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以刊布于世。复从事方志学之研究，广搜博采，取精用弘，剖析源流，甄审得失，复为《方志学通论》数十万言。吁！何其多也，非兼人之力不及此！亦由君治学勤奋过人，故精进若是之速也。余以是益敬之重之。君所为《方志学通论》将出版，属余为序其书，余观其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自来论方志者，皆不及此书之全备而精密。行见此书一出，沾溉无穷。今之新修地方志书者，又必人手一编，以此为津逮也。则君论述之功，岂可泯哉！余既服其难能，因书此以遗之，亦聊以志余赞叹之意云。

张舜徽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前 言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八千五百种左右，共十一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著作形式，与其他的文体一样，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一出现便是一部完美的著作。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因此，我们在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时，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得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关于这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要把研究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12页）。然而目前研究方志起源的某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仅就某部书

来谈起源，其结果自然不可能讲清方志的起源。学术思想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方志的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的原因。所以我们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社会的条件，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方志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不仅要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且要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编纂方法，以做到推陈出新，为今天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服务。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还出现不同的名称，所记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逐步丰富完善起来。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又都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因而也就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研究方志发展史，必须密切联系有关社会条件，否则就讲不清各阶段的特点和名称、内容、体例的发展与变化，最多只能做些现象的罗列。

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也就是前人所讲的“郡县之书”。由于它具有舆地著作一些特性，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封建时代的目录学分类，都将它和一般舆地著作一样列在史部地理类。当时方志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样分法是可以理解的。而目前研究方志的论著中，普遍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把历来公认的许多著名的舆地著作都纳入了方志的行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等等，有的甚至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都称为方志。这么一来，历史地理学就完全被方志学所取代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已经纷纷提出了批评。谭其骧先生1983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全国史志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已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

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有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是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就不能叫它地方志。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大家都知道，在地理类里头就有一部分叫总志之书，一部分叫方志之书，那就分得很清楚。凡是记载全国的，就在总志里头；记载一个地方的，就在方志里头。把各省的通志、府、州、县志叫做方志，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科学的。可是这几年，我看到不少地方出版的地方志通讯一类刊物上所载的文章，往往把总志与方志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搞地方志工作的，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分清楚。《禹贡》是《尚书》的一篇，《汉书·地理志》是《汉书》的一篇，因为没有单独成书，所以《四库全书》里头当然没有把它列为地方总志；因为它不是一本书，但是它的性质无疑是总志。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它不列在《四库全书》总志里头而不把它当成一部总志。各地的地方志都不应该追溯到《禹贡》、《汉书·地理志》上去。要把总志和方志分清楚。”（《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五期《地方志与总志及历代地方行政区划》）谭先生的讲话很中肯，应当引起方志学界足够的重视。

方志的性质是具有“亦地亦史”的地方性综合著作，记载内容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它的性质既不是史，也不是地，而是介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尽管它原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特性，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在编修新志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创新必须在总结旧志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完全丢掉方志的特点而去创新，那编纂出来的也就不可能是方志。当然，社会主义时代编修的方志，必须反映社会

主义社会的精神面貌，如果一切均依旧志体例篇目，内容很少有时代气息，自然也就谈不上创新。从方志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时代的篇目、内容，总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现在提倡要创立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方志理论，编修新型的方志。但如果对旧志的发展演变和旧志的编纂理论一无所知，新方志理论从何而来？新方志又如何编修？没有继承就绝无创新之理，这是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相反，我们对旧方志理论和编纂方法的探索、研究，目的正在于批判地继承，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为编修新志、创立社会主义新的方志理论服务。

方志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我从事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志既是史学的一个旁支，所以我对它要分点精力进行研究。六十年代，我曾写过二十余万字的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初稿连同有关资料和卡片全都丢失了，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党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志高潮。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从1981年起，校、系有关领导要我给高年级学生开设“方志学”课，于是不得不重理旧业，从头做起。几年来又多次应许多省份和兄弟院校的邀请，为他们举办的方志讲习班、培训班讲课，所到之处，学员们都希望将讲稿印发。他们的热切求知愿望，使我深受感动。就这样遂决心将自己对方志和方志学的看法、想法重新写成这部《方志学通论》。这样既解决教材之需要，又可供各地修志工作者参考。

要了解方志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是需要翻阅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方志著作的。但是，要大多数人做到这点比较困难，因为有许多方志只有在全国比较大的少数图书馆方能看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在书中尽可能多的抄录了有代表性的方志篇目。至于像敦煌发现的唐代图经，大家看到的机会就更少了。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唐代图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故将三部唐代图经

残卷全文附上。

我是在吾师黎子耀教授引导下进入史学园地的，而对于方志学的探索，又是受黎师的启迪。他在六十年代初已经提出，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方志，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旁支。从那时起，我就按此精神进行钻研。这次在重新撰写过程中，尽可能参考了所能见到的方志学界老一代的著作和新的研究成果，从中吸取营养，在此谨向先辈和同仁致以衷心感谢！当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于具有争论性的问题，一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限于学术水平和见闻，加之这又是一门新的学科，书中错误疏失，实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史学界特别是方志学界专家、方志编纂新秀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书中所有表格除一幅由阙维民同志代为制作，其余皆为小女仓晓梅绘制或复制，她并参与了定稿后的誊写工作。一氓老人在百忙中为拙稿书写了题签；当代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教授撰写了题辞，还有许多师友为这部书稿的撰述提供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书能够顺利的出版，自然更要感谢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为我提供了出版条件，并为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仓修良

一九八六年春节于杭州大学